高教动态

2026 年第 11 期（总第 143 期）

汉江师范学院发展规划处（学科建设办、高教研究所）　　2026 年 11 月 17 日

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二）

目　录

■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
■ 分类推进高校改革——让每条“赛道”都跑出精彩
■ 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核心要义与实现路径
■ 高校分类改革如何跳出“越分类、越趋同”悖论
■ 分类改革背景下应用型高校建设：内涵、定位与转型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作出系统部署。

《意见》指出，分类推进高校改革，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顺应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发展特征和学龄人口变化趋势，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协同育人，以统筹规划为先导、以分类改革为动力、以科学

评价为牵引，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意见》指出，要优化分类布局结构。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根据隶属关系建立多元适配的高校分类模式；统筹中央部门所属高校和地方高校协同发展；统筹高等教育资源布局；统筹完善人才培养结构；统筹用好国际国内资源。

《意见》指出，要激发分类发展动能。打造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力量，发挥好“双一流”建设对研究型大学改革的牵引作用；建强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力量，实施优质特色应用型本科院校和学科专业建设工程，优化实施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夯实服务行业创新发展支点力量，发挥行业特色高校传统优势，强化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构建高等教育融合发展新形态，探索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

《意见》指出，要健全分类发展机制。完善高校科学设置机制，强化国家顶层设计、宏观指导；建立高校分类管理机制，推动形成与高校分类发展相适应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构建多赛道、多主体的评价体系；健全资源配置激励机制；强化人才供需适配机制，完善以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的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

《意见》强调，要加强组织实施，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全过程各方面，全面加强高校党的建设，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稳妥推进改革，合理引导预期，营造良好氛围。

（信息来源：新华社 2026 年 9 月 20 日）

分类推进高校改革——让每条“赛道”都跑出精彩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作出系统部署。

2025 年，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 4872.57 万人，毛入学率达 61.3%，进入世界公认的普及化阶段。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部分高校同质化发展等问题依然突出，制约了高等教育整体效能的提升。如何让各类高校科学定位、各

展所长？《意见》从优化分类布局结构、激发分类发展动能、健全分类发展机制等方面，为这道“必答题”提供了系统答案。

确立分类框架，开辟多元赛道

“《意见》确立的高校分类框架，是我国高校分类改革政策的进一步延续和深化。《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明确提出‘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明确各类高校发展定位’。所以，高校分类框架是以‘基本办学定位’加‘基本方向’为主构成的高校基本类型分属结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教所教授张男星认为。

《意见》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根据隶属关系建立多元适配的高校分类模式，统筹中央部门所属高校和地方高校协同发展。

同时，《意见》明确“激发分类发展动能”，发挥好“双一流”建设对研究型大学改革的牵引作用，实施优质特色应用型本科院校和学科专业建设工程，优化实施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发挥行业特色高校传统优势，构建高等教育融合发展新形态。

“不以名称、规模、学科来界定高校分类，而是以办学特色来划分高校类型，促进高校合理竞争、各安其位。”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表示，“让各类高校在不同‘赛道’特色发展，在擅长领域发挥优势。”

“分类是方法、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重在以改革求发展，而不是简单地给高校分类、贴标签。”教育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主要希望通过分类为高校提供与之相适宜的支持政策，引导高校结合自身优势，明确办学定位和发展方向，进而推动自身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

先行探路，提供可借鉴样本

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并非从零起步。近年来，一些省份和高校已率先破题，为《意见》落地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

省域层面，制度先行。上海是全国最早启动高校分类改革的城市——2018 年 3 月起施行《上海市高等教育促进条例》，提出“建立健全高等学校分类发展体系”；2025 年 3 月，遴选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上海

电力大学、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上海电机学院5所市属高校，启动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推动市属高校从“学科逻辑”向“产业逻辑”转型。广东在国家大框架下构建“三类五型”细化体系，并在2026年5月印发的新一轮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提升计划实施方案中，明确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计划不再区分重点建设高校与重点学科建设高校类别，建立健全高校动态调整机制。

高校层面，实践探路。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将9个工科学院重组为5个技术学部，组建本科生院，专业学位研究生占比达72%，推行两年制培养与驻企实践，还在校园里建起与企业生产线一致的中试平台。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则聚焦深圳“20+8”产业集群动态调整专业布局，专业设置与深圳产业匹配度达100%，牵头建设国家级市域产教联合体。此外，山东推行“一校一策”，引导高校立足区域产业需求凝练办学特色，鲁东大学以“响应、更新、融合、服务”四维理念打造应用型转型样板；江苏则将企业挂职经历、技术专利转化、行业标准制定纳入教师职称评审核心指标，以评价改革牵引应用型办学。

“技能型高校只要坚守类型定位、深耕产教融合、服务国家战略，就能够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彰显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许建领表示。类似的判断，正成为越来越多高校的共识：分类不是把高校分成三六九等，而是让每所高校在适合自己的“赛道”上各展所长。

立足办学赛道，扛起特色担当

《意见》已然搭建起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制度框架，关键在于落地见效。

“研究型大学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是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赢得战略主动的关键引擎。”天津大学校长柴立元表示，“《意见》突出强调了研究型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战略任务。面向未来，天津大学将自觉扛起‘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深化教学科研改革，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攻关，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时代使命，以一流办学成效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高水平应用型大学一头连接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一头连接产业发展和社会需求，是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北方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张启鸿表示，“应用型大学应以分类发展

明确定位，以人工智能变革重塑能力，以产教融合和科教融汇提升质量，着力培养能够驾驭智能技术、解决复杂问题、创造实际价值并承担社会责任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意见》指出，发挥行业特色高校传统优势，强化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行业特色高校依托行业立校办校、以特色优势兴校强校，是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体系重要方阵。”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高新波表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不断校准作为电子信息行业特色大学在强国建设中的时代方位和使命任务，坚守行业特色大学本色，聚焦‘信息’关键行业领域，不断提升对强国建设的支撑力、贡献力。”

专家们认为，从分类发展到各展所长，不同类型高校在适合自己的赛道上办出特色、办出水平，高等教育的整体效能必将持续提升。

（信息来源：王轩尧《光明日报》2026 年 9 月 22 日）

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核心要义与实现路径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作出了具体安排。《意见》发布后，高教界反应热烈，不少高校已经在对照文件认真思考和谋划本校的发展问题。《意见》最大的特点，是将高校分类作了系统化要求，强调从布局到机制、从评价到资源、从政府到高校整体谋划并一体推进。

贯彻《意见》精神，必须先理解其背景和目标要求。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后普及化阶段，2025 年，毛入学率达到 61.30%，在学规模 4872.57 万人，高校数量 3167 所。我国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普及化，必然引起并要求高等学校目标和职能的分化与多样化，这是一条基本规律。然而，多年来，不少高校办学定位趋同，发展目标游离，按照学术型和研究型大学模式办学，把升格、更名、争学位点等当成办学的主要目标和业绩。同时，从 2022 年开始，学龄人口进入下降通道。人口结构的变化给高等教育布局带来了新的挑战。产业转型升级对人才类型、层次、结构也提出更加多元的需求。可以说，我国高等教育正处在一个既要做大更要做好做强的关口，处在从外延

扩张转向内涵发展、从规模数量转向质量特色、从同质竞争转向分类发展的关键阶段。分类推进高校改革，正是对这些新形势、新情况和新问题的积极回应。

准确理解和认真贯彻《意见》精神，首先要避免两个误区。一是把分类改革解读成简单的类型区分，以为给高校安上研究型、应用型或技能型的标签，改革就算大功告成；二是只盯着某几条具体政策条文，看不到政策背后的整体逻辑，碎片化地应对改革要求。《意见》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如何推动和靠什么力量推动，落实《意见》的过程中可能面临哪些障碍，政府和高校各自承担什么责任等，这些需要首先厘清。

准确领会《意见》内涵要义

《意见》内容十分丰富，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理解。

1.《意见》是系统的改革方案，不单是类型划分

《意见》的逻辑主线很清楚，即以统筹规划为先导、以分类改革为动力、以科学评价为牵引，以提高教育质量为目的。统筹规划解决的是怎样布局，分类改革解决的是如何激发动能，科学评价解决的是怎么引导和约束。围绕这条主线，《意见》从四个方面作了总体部署。第一是优化分类布局结构，科学构建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高校分类体系，区分综合性和特色化基本方向，同时统筹中央部门所属高校和地方高校协同发展，统筹高等教育资源布局、人才培养结构和国际国内资源。第二是健全分类发展机制，完善高校科学设置机制、分类管理机制和分类评价机制，构建多赛道、多主体的评价体系，健全资源配置激励机制，强化人才供需协同。第三是激发分类发展动能，分别打造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支撑力量、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力量、服务行业创新发展的支点力量，构建高等教育融合发展新形态。第四是加强组织实施，强调党的领导、稳妥推进、营造良好氛围。布局是前提，机制是保障，动能是结果，实施是落点。四者环环相扣，构成一个整体。

可见，全面准确理解《意见》，就是要把它当成一整套制度安排，而不是一张类型名单。判断分类推进高校改革成效，不能只看高校有没有把自己归入某一类，而要观察布局、机制、动能、实施这几条线是否真正打通，分类发展是否真正落实。

2.分类不等于分层，也不等于身份固化

高校分类不是分层分等。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是按办学功能划分的类型，各自承担不同的目标、职责和任务。研究型高校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做基础前沿研究和关键技术突破，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应用型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做应用研究、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培养实践型复合型人才；技能型高校对接生产一线，培养高技能人才。其间功能不同，各有所长，不存在谁高谁低之分。但在长期形成的文凭观、人才观、知识观、择业观等影响下，人们习惯性地把类型当成等级，这种惯性不破除，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就会变形走样。高校为了争取更高地位，总是千方百计地往“更高层次”上靠拢，应用型高校淡化地方服务和实践教学，技能型高校耻于技能培养，办学本分和初心反而被抛在一旁。

同时，分类也容易滑向固化。《意见》强调根据隶属关系建立多元适配的高校分类模式。本身就说明分类是动态的、有弹性的，允许各地因地制宜、一省一策。分类是给高校一个清晰的坐标，帮助其在坐标上把特色做特、强项做强，提高办学实力，但不是把高校僵硬地框死在某个类型里不允许变动。定位可以调整，类型可以优化。真正要守住的，是功能自觉和特色追求，是对自身办学本位的清醒认识。

3.“三大项目” 意在引导支持，牵引各自建成一流

《意见》明确提出，发挥好“双一流”建设对研究型大学改革的牵引作用；建强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力量，实施优质特色应用型本科院校和学科专业建设工程，优化实施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三大项目”“三套抓手”分别对应三类高校，用意在于分类引导和分类支持，使不同类型高校都有一流标准，也都能够建成一流。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各类高等学校接近3200所，国家财力有限，不可能每一所高校都能获得项目支持，必须发挥举国体制优势，集中优质资源率先支持建设一批高质量高校，起到带头、示范和引领作用。但不能把“双一流”“双优”和“新双高”当成新的等级符号，以为哪所高校得到了某个项目支持，就因此进入一流行列，就高人一等，而那些没有机会列入项目的高校就低人一头。同时，“三大项目”也不仅仅针对那些有望进入支持的高校，而是所有高校都需要按照项目示范标准加快建设

步伐，切实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三大项目”的评价，也因应不同赛道分别设置标准，如评价应用型高校，重点是考查其服务区域贡献、技术转化成效和产教融合水平；技能型高校重在评价人才培养质量及其岗位胜任能力等。不同赛道间有着各自的分量，不能拿一把尺子去量所有高校。

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中面临的现实困境

高校分类发展和分类评价向来被视作世界性难题，在我国更是如此。

1. 观念层面上的分类与分层阻力

首先来自观念。家长选学校看层次看名头，企业与高校合作看排名看地位，用人单位招人看牌子看声望。在这种环境里，应用型、技能型高校即使想立足本职扎扎实实办学，也很难及时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观念是“长走廊”慢变量，一经形成就成为刻板印象，而观念又直接影响着高等教育发展的社会环境和土壤。这说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制度建设是一方面，观念引导同样是长期而重要的任务。如果社会依然习惯于用一把尺子看待和衡量所有高校，分类改革就不易真正立得住和行得久。

2. 评价指挥棒造成高校学术漂移

学位点评审、职称评聘、科研项目申报、经费拨款、办学评估、人才帽子等许多环节如果依然沿用单一的学术标准，学术漂移现象就难以有效遏制。应用型和技能型高校为了在评审、职称、排名中利益不受损，有意无意地向学术型和研究型大学靠近，口头上和文件中重视应用型和技能型，行动上却不得不往论文、课题、平台上用心用力用功。结果，一些地方高校由于缺乏相应基础和条件，学术质量比不上研究型大学，实践本领又比不过技能型高校，两头落空。同样，以高职高专为主体的技能型高校，又都希望升格本科，按照本科模式办学，成为本科教育的翻版或压缩版，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技术，实习实训被取消，出现明显的去技能化倾向。这些问题的产生，不能怪罪哪一所高校办学不守本分和规矩，关键在于激励结构本身不尽合理。无论是正式制度或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习俗，都在鼓励高校垂直向上发展。所以，评价指挥棒不改，分类改革就难以真正纵深推进和取得实效，这也是分类改革最需要下力气的地方。

3. 省级统筹和多元协同的缺失

《意见》在强化中央作用的同时，把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很大空间留给了省级统筹，强调根据隶属关系建立多元适配的高校分类模式。其方向和路线正确，但执行起来并不容易。各省产业基础、高校结构、发展基础与重点差别很大，如何把国家框架落到本省实际，形成既体现国家意图又符合本地需求的细化方案或次级方案，考验着地方政府的教育治理能力。现实中容易出两种偏差，一是被动等待国家统一制定分类标准，以此简单照搬；二是任由高校各自为政，省级统筹流于形式。如果省级统筹关口守不严，分类改革的整体效果就要打折扣。多元适配要做实，既需要中央给出清晰的原则和底线，更需要地方拿出符合实际的具体方案，两者必须相互衔接和协调。不过，也要看到，省级政府在分类管理问题上，也有其自身利益考量。一方面，要结合本地区实际做好高校的二次分类，促进本地高校多样化发展；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总是希望本地高校更多地上档次上水平，从中央获得更多支持，同时希望比其他地区建设更多高层次和高水平的大学，导致本地高校发展定位和目标趋同，由此形成与中央政策的偏差。

4. 社会参与和市场机制缺位

《意见》强调强化人才供需适配机制。实际上是把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引进高等教育治理中来。然而，现实情况是，行业企业参与办学、参与评价、参与管理、参与人才培养的渠道还不畅通，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不少还停留在形式上，企业的积极性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市场和社会对高校办学质量和贡献的反馈，也缺少制度化的渠道，难以转化为高校办学导向和资源配置的依据。分类发展如若只靠政府和高校两端用力，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得不到激活，分类发展的动能和约束就会严重不足。如何把市场需求、行业评价、社会认可引入分类治理，是贯彻落实文件中需要着力破解的重大课题。

多方合力推进高校分类改革见实效

高校分类改革涉及多方面关系和利益，只有多方协作，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才能真正见实效。

1. 政府的责任与作为

加强顶层设计和省级统筹。政府首先必须抓好顶层设计。中央层面统筹好

部属高校和地方高校之间、不同类型高校之间的关系，明确分类的基本框架和总体原则，明确区域布局，守住公平和质量底线，对省级政府分类政策、分类管理与分类效果进行指导、评价和问责。省级政府要承担分类推进改革的具体责任，结合本省经济社会发展、产业布局和高校实际，细化分类方案，明确每一类、每一所高校的功能定位和支持政策。省级统筹要做实，需要建立跨部门的协调机制，把教育、产业、人社、财政等力量整合，避免教育部门单打独斗，也要避免政策之间相互冲突。分类改革涉及面广、利益关系复杂，必须从全局出发，从国家大局出发，既要加强统筹和管理力度，还要尊重高校办学自主权。

加强分类管理和分类评价。分类管理要落到办学条件、招生计划、学位点授权、经费投入等具体环节，对不同类型高校实行差别化的管理标准和支持方式。分类评价是重要抓手，要真正构建起多赛道、多主体的评价体系。多赛道，就是针对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分别设置评价重点和指标体系，研究型高校看原始创新和拔尖人才培养，应用型看服务区域和成果转化，技能型看产教融合和岗位胜任力。多主体，就是让行业企业、用人单位、第三方机构参与评价，改变过去主要由行政部门评、主要评学术的单一局面。评价指挥棒一旦真正分赛道、多主体，高校的办学行为自然会跟着调整。这也是文件提出构建多赛道、多主体评价体系的用意所在。

优化资源配置和项目牵引。资源配置要跟分类挂钩。经费投入、平台建设、项目支持，应向在本类型内办得好的高校倾斜，让那些守本分、安其位、办出特色的高校得到实实在在的益处。“三大项目”的实施要改进，减少形式化评审，多注重建设成效，防止项目异化成名誉和牌子竞争。同时要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对定位清晰、建设成效好的高校持续支持，对定位模糊、建设不佳的高校及时预警，建立退出机制，使资源配置真正起到引导分类发展的功能。资源是高校办学的生命线，资源配置的导向变了，高校的行为才会跟着变。

强化人才培养供需协调。政府要在人才供需适配和社会预期引导上下功夫。一方面，推动学科专业设置与国家战略需求和产业发展相适应，健全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以使高校培养的人才能够被市场用得上、用得好，畅通从培养到使用的通道。另一方面，要主动引导社会预期，改善公共用人导向，破除唯学历、唯学校出身的倾向，使不同类型高校的毕业生都能凭真才实学获得体面

的就业和发展机会。政府还要善于讲清楚分类改革的道理，通过信息公开、典型宣传等方式，逐步改变社会对高校的单一评价惯性，为分类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和社会氛围。《意见》强调合理引导预期，营造良好氛围，其意义即在于此。社会观念转变虽然慢，却是分类改革能否行稳致远的深层支撑。

2. 高校的责任与作为

研究型大学要服务国家战略需要。研究型高校要把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为自己的主责主业，集中力量搞好基础研究；强化原始创新，发挥国家重要科技力量作用，适应知识生产模式转变形势；加强有组织研究，鼓励自由研究，注重交叉研究；改变长期以来单纯以学科为中心的科学研究，开展以实践为中心、问题为中心和任务为中心的新型科研。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发现、培养和评价规律，推进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体系建设。评价研究型大学的贡献，主要看其为国家解决多少真问题、培养多少真人才。应用型高校要把服务区域发展做深做实。

应用型高校要真正把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作为立身之本，成为复合型、实践型人才培养的主阵地，产教融合的催化剂，技术创新的加速器，成果转化的孵化器。做到这一点，学科专业设置要围绕区域产业链布局，建立健全专业动态调整机制。课程内容要跟着岗位需求走，强化实践教学。教师评价、科研导向要转向解决实际问题、转化实际成果。人才培养要强化实践能力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还要主动打破学校围墙，充分吸收行业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实习实训和质量评价。应用型高校的价值，根本在于把服务地方工作做成不可替代的本领，这也是地方应用型高校存在和发展的本钱。技能型高校要坚守技能本色。

技能型高校要对接生产实践一线，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技能型高校要根据职业和岗位需要设置专业和灵活调整专业，将岗位知识和能力作为课程建设的重要标准。要把产教融合做实，把双师型教师队伍建好，不断改善和提高办学条件，使学生能够在真实的生产场景中练出真本事。技能型高校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学生过硬的操作能力和企业用人的口碑上。守得住这个本位，技能型高校就能赢得尊重。当然，也不能将技能过于狭隘化，既需要培养未来从业所需的岗位技能，也需要培养学生健全的心智技能、社会技能、团队合作能力，

还需要培养学生爱岗敬业和立足岗位创新的能力，尤其是人工智能时代，要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技术伦理道德能力。

分类要求要穿透到校内各环节。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不能只停留在学校层面的定位，要贯穿到院系、学科、评价和人事制度各方面。不同类型定位，有着不同的领域和赛道，领域与赛道之间虽然相互关联，却也有着明确和明显的界限，因而有着各自相对独立的系统性要求。比如，定位于应用型的高校，其发展目标、资源配置、队伍建设、学科专业设置、课程体系、院系考核、教师职称评定、科研方向、管理体制机制等，就要跟着定位运转，实现形式结构与实质建设之间内在统一。校内改革必须整体推进，把分类要求分解到每一个院系、每一位教师身上，使每一个人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力量往哪里用。特别是教师评价和职称制度，要针对不同功能定位设置相应的标准，不论从事应用研究还是技能训练或者专注教学的教师，都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

（信息来源：刘振天《中国高等教育》2026 年第 20 期）

高校分类改革如何跳出“越分类、越趋同”悖论

“我们现在搞分类改革，初衷是解决‘千校一面’、一把尺子量到底的问题。但我们需要反过来问一句：‘千校一面’是怎么来的？那把尺子又是谁拿着的？”

不久前，在江苏大学举行的《高校教育管理》创刊二十周年暨高等教育学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上，北京师范大学原副校长周作宇的这句“反问”，让台下 170 多位与会学者陷入了片刻沉默。

这场研讨会的主题为“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探讨的是随着今年 9 月《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下发而确立的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三类高校的基本框架。然而，学术界的讨论却远比文件本身更复杂——分类改革如何破解“千校一面”的困局？人工智能（AI）的到来是否正动摇传统分类体系的根基？在分类格局中，地方高校该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

一个悖论：政策在分类，实践在趋同

所谓的“千校一面”本质上是高校建设的“趋同化”，而在周作宇看来，这种趋同并非偶然。“行政权力的强制性同构”“对标杆追赶的模仿性同构”及“学术共同体的规范性同构的专业标准”，这三重机制的叠加，使得“分类”的政策意图在实践中常常会被消解为新一轮的趋同。

对此，浙江外国语学院原党委书记宣勇有着更深切的体会。在对地方高校的定位问题进行长期观察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全国地方高校对自身办学定位的表述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词是“特色鲜明”和“高水平”。

“‘特色鲜明’其实最不鲜明，‘高水平’则是所有大学都喜欢用的词。”宣勇直言，中国地方高校陷入了“定位空转”——大而全但不甘心，想做研究但经费不足，一直在指标和排名中内卷。

“地方高校最核心的问题是没有建立起主体性。”宣勇认为，所谓主体性，就是学校自身的目的性、自主性和自觉性。“我们跟着政策指挥棒走，跟着排名走，跟着标杆学校走，但很少问自己：这所大学到底为谁服务？不可替代性在哪里？”

西南大学原副校长崔延强从历史视角提供了另一种解释。他指出，在计划经济时代，高校的分类非常清晰——综合大学、行业院校、专科学校，不同高校各安其位。但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一波又一波的“升格热”和“合并潮”，行业院校争相摘掉“行业帽子”，向综合性大学看齐，最终形成了“无工不综合、无校不博士”的格局。

“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重新贴标签，而是扭转几十年积累下来的惯性思维。”崔延强说。

一股冲击波：AI 正在重构分类逻辑

如果说“越分类，越趋同”是分类改革的内部矛盾，AI 的迅猛发展则正从外部动摇整个分类体系的知识基础。

论坛上，浙江师范大学教授刘爱生直言，传统工业时代“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的三元分类体系，建立在“原理知识—转化知识—操作知识”的单向线性逻辑上。但生成式 AI 的出现正在解构这一逻辑，知识生产从机构垄断

走向网络化扩散，人才需求从单一技能转向复合能力，社会服务从类型绑定走向功能适配。

“简单来说，以前研究型大学垄断知识生产，应用型高校做转化，技能型院校培养操作工。然而，如今 AI 让地方高校也能做出顶刊成果，职业院校的团队能攻克‘人造太阳’的核心部件，知识生产的壁垒正在被打破。”刘爱生用了一组案例佐证：井冈山大学的学者团队在《自然》发表锂离子电池供应链脱碳研究；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团队研发钢铁生产 AI 检测系统，检测精度达 95%；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师生团队直接嵌入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研究，攻克高温合金精密加工难题……

“当一所高职院校能参与全球顶尖大科学工程时，传统的分类标签还能解释什么？”对此，刘爱生提出了一个“跨维思维”的新概念——不再把高校压缩在一维数轴上排序，而是将其视为高维特征空间中的向量，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只是“初始坐标”，而非不可逾越的身份边界。

讨论中，多位青年学者也表达了类似的判断——AI 对高校分类的挑战不是技术工具层面的升级，而是底层知识逻辑的重构。当 AI 打破了知识获取的边界，高校间的核心差异将不再是“你属于哪一类”，而是“你能解决什么真问题”。

一场理论转向：从“分类管理”到“分类治理”

面对内外双重挑战，学术界正在酝酿一场理论转向。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办公室副主任魏署光将其概括为“三个转变”——理论上从类型划分走向功能分化；政策上从统一尺度走向分类施策；治理上从分类管理走向分类治理。

“以前我们在对分类的谈论中，关注的是‘这是一所什么类型的大学’，落脚点是分类标准、指标、边界；如今，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大学很难用单一维度和固定标签界定。”魏署光说，分类研究需要追问的是它主要承担什么功能，形成了什么功能组合，比较优势在哪里。

这与周作宇的判断不谋而合。

“分类改革的核心矛盾是科层体系追求统一目标与整体效率，但高等教育组织本身带有学术自由和学院自治的属性。”周作宇指出，“分类不是目的，

而是手段。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建立‘分类定位—资源配置—评价机制’之间的制度耦合，使分类真正转化为稳定的政府制度安排和高校组织行为。”

广州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马凤岐则从规模结构的角度，勾勒了分类体系的未来图景。根据他的预测，到 2035 年，我国高校的总数将控制在 3000 所左右，其中研究型大学约 300 所（占 10%）、应用型高校约 1500 所、技能型高校约 1500 所。研究型大学承担 70%以上的博士生培养，应用型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技能型高校对接产业一线需求。

“这个结构的实现面临三大挑战——人口下降导致的生源缩减、财政紧张带来的投入压力，以及优质师资供给不足。”马凤岐直言，分类改革不是教育系统内部的事，而是整个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缩影。

对此，《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执行主编王建华表示，高等教育领域长期存在更多、更高、更优三个执念：追求更多人上大学，追求更高层次的学历，追求更优质的排名。然而，这三个执念背后都是工业化时代的思维定式。

“当高等教育资源从稀缺走向充裕，甚至相对过剩时，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机会公平还是不是唯一支点？接受高等教育是否必然比职业教育更有价值？”王建华说，“排行榜在把少数学校排在前面的同时，也给绝大多数学校贴上了‘无名化’的标签。但教育的本质是让每一个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而不是与别人比较。”

一种出路：找到自己的“不可替代性”

理论的转向最终要落到实践。地方高校在分类改革中，到底应该怎么走？

宣勇给出的答案是回到价值定位本身。他以自己曾任职的浙江农林大学和浙江外国语学院为例——前者明确“为浙江培养生态文明建设人才”，砍掉与生态无关的专业；后者定位“服务国家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走小而精的路线。

“定位不是写在规划里的口号，而是一个选择。选择做什么，更要选择不做什么。”宣勇说，“应用型大学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应用于谁、为谁所用，你的资源、师资、可能性能否支撑这个定位，避免陷入‘财小志大’的困境。”

江苏大学则提供了另一种样本。作为一所行业特色明显的地方高校，江苏大学坚持“工中有农、以工强农”的特色，深耕农业工程 60 余年，培养了全

国 1/3 以上的农机行业管理者。该校学科建设与发展规划处处长杨娟在主旨报告中直言：“我们不是综合性大学的缩小版，而是农业装备领域的国家队。”

“在分类改革的框架下，江苏大学的路径或许正是‘研究应用型’的典型，既做基础研究，也深度嵌入产业一线，在智能农机装备的创新生态中找到自己的生态位。”杨娟说。

吉林大学副校长付君分享的农机专业改革案例则展示了学科层面的分类实践。该校农业机械化工程专业诞生于 1955 年，是全国第一个农机专业。面对 AI 时代的挑战，他们没有照搬研究型大学的模式，而是从课程体系到实践教学全面重构：去掉与产业无关的课程，增加实践教学学分，让学生从大一开始就接触真实农机装备的研发和生产。

“人才培养不能等专业设置调整了再改，因为 4 年之后，你培养的人才面对的又是一个全新的产业环境。”付君说，“关键是跳出自己的专业，跳出自己的学院，想清楚产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

（信息来源：金梦婷《中国科学报》2026 年 11 月 3 日）

分类改革背景下应用型高校建设：内涵、定位与转型

一、引言

推动科学研究重心转向应用端，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提升竞争力的共同战略。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的《科学：新黄金时代》，要求高校从“学术自足的知识生产者”重新定位为“与产业、区域和国家使命耦合的知识组织”；日本制定的《第七期科学技术与创新基本计划》，将“推动大学服务地方经济和战略产业”置于“国家生存”的高度；英国发布了知识交换框架（KEF）作为高校“知识交换”的绩效测量工具，使“拉近与产业距离”与拨款挂钩；德国设立 DATI（德国技术转化和创新局）推动应用技术大学与区域创新体系结合。

与上述国家举措不同的是，中国通过建立专门类型的高校组织，辅以政策引导实现应用型转向。2025 年 1 月发布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明确提出，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分类

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目标是通过建设专门类型的应用型高校强化应用型研究，拉近高校与产业的技术距离，支撑国家战略能力跃升。2026 年初，教育部提出应用型高校建设的“双优”工程，即“办学能力优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要实现这一目标，应用型高校要抓好两件事：一是对外融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成为区域发展的引擎；二是对内实现办学模式从传统学术型向应用型转变，探索应用型的治理、教学、科研模式。这一建设路径的核心是应用型高校不仅自身教学与科研能力要强，更要融入地方，成为区域发展的引擎。

应用型高校如何成为区域发展的引擎？学界尚未形成共识。根源在于应用型高校的内涵界定模糊不清，致使发展方向和建设路径存在分歧。近现代以来大学组织演化史的相关研究表明，知识性质决定了大学组织的类型。高等教育组织以高深知识为工作“材料”，知识性质和服务面向决定了实施这种知识教育的大学组织类型，进而影响了该大学组织知识活动的范围。应用型高校的内涵同样根植于知识与组织关系的内核之中，因此，本文首先从知识性质与服务面向两个维度界定应用型高校的基本内涵，阐明其区别于研究型高校与技能型高校的类型边界；进而以此为基点，从外部融入与内部转型两个层面，讨论应用型高校的建设路径。

需要说明的是，鉴于工程教育是应用型高校实践导向最为直观和典型的领域，本文在论述中主要以其为例，其面向真实实践情境的应用逻辑，同样适用于医学、商学、师范及其他专业领域。

二、内涵：应用型高校的合法性

应用型高校的基本内涵建立在合法性基础上，其合法性由知识性质和服务面向共同塑造。其中，知识性质决定了应用型高校知识活动的场域边界，构成其类型的本体论基础；服务对象规定了应用型高校知识活动的功能指向，构成其类型的价值论基础。两者共同构成了应用型高校区别于研究型高校与技能型高校的本质特征。

（一）知识性质：应用型高校存在的四大基石

从知识性质来看，应用型高校的合法性建立在高深知识应用、专业教育、实践导向和基于理论的技术活动等“四大基石”之上。

第一块基石：侧重高深知识活动谱系的“应用”环节。伯顿·克拉克在《高

等教育系统》中指出，高校基于高深知识的活动，可以划分为“发现、提炼、保存、传授、应用”五个环节，构成一条完整的活动谱系。其中，“应用”是知识活动的实践环节，是指“学者实际运用他们的知识为社会其他部门提供帮助”。这一活动是高深知识从理论形态转向实践价值的过程，即应用型高校通过对接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推动高深知识从理论形态转化为实践形态。不同类型的高校依据其在知识活动谱系中的侧重环节获得各自的功能定位。研究型高校以生产理论性的新知识为使命，侧重谱系前端的基础发现环节，辅以实践验证知识发现；应用型高校以高深知识向产业、行业和社会领域的应用为使命，侧重谱系后端的应用环节，生产并沉淀保存实践应用所产生的情景化知识。两类高校在同一知识活动谱系中既有所分工，又相互协同，拥有平等的知识论地位。

第二块基石：以专业教育为重心。本·戴维在《学术的中心：英法德美》中指出，19 世纪以来的欧美高等教育是由基础的文理教育（basic arts and science）和专业性职业教育（即专业教育，learned profession）组成的，二者的人才培养导向存在本质差异。基础文理教育以通识教育、心智教育为核心，侧重广博知识积累与心智能力塑造，除培养学者、教师、文职人员外，几乎不具备直接的职业性；专业教育兼具学术与职业双重品质，是以社会职业体系的专门化教育为核心，侧重实践导向的高深知识应用与职业能力培养，毕业生从事的是相关产业/行业的职业工作，如工程师、医生、司法、财会等专业性工作，基础文理则不具备职业性。随着现代产业分工日益细化，Professional 的范围由传统的神、法、医扩展至工程、医学、商学、管理、社会工作等众多领域，专业教育由此成为高等教育对接社会职业体系与产业需求的主要载体。应用型高校正是以面向职业世界的专业化高深知识为主体，实施专业教育的高校类型。自由教育与专业教育各有侧重，可以解释研究型和应用型的知识类型之别。

第三块基石：追求专业教育的应用导向。德里克·博克对美国研究型大学的专业学院考察，发现其专业教育追求理论导向。故 Professional 可进一步区分为学术/理论导向（academic & theoretical）与实践/应用导向（practical & applied）两种类型，并在组织形态上形成鲜明对照。研究型高校的专业学院追

求理论价值，培养学生“无用方为大用”的理论底蕴，主要围绕专业基础理论、分析范式与学术逻辑展开，注重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追求理论深度与长效价值。应用型高校侧重实践导向，以系统专业知识为依托，围绕产业场景、行业真实议题开展研究，聚焦高深知识的转化、整合与落地运用，以系统专业理论知识解决行业、产业特定问题，推动知识服务产业发展。其教学目标在于强调理论知识的综合运用与场景适配，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解决产业实际问题的能力。德国的应用技术大学、英国的多科技术大学，正是实践导向专业教育制度化的结果。理论导向与实践导向之分，可以解释研究型和应用型高校的 Professional 差异。

第四块基石：基于理论的技术。技术形态分为“基于理论的技术”与“基于经验的技能”两种类型，分别对应应用型高校与技能型高校的知识类型。应用型高校以专业理论知识为载体，承担着科学原理向工程方案、行业规范转化的中介职能。其教育活动依托完整的专业理论体系，培养学生工程创新能力。而技能型高校则以具体场景中的实践知识为载体，聚焦特定生产环节的功能实现。其教学活动侧重生产岗位的指令执行、实操规范与临场经验积累，以熟练完成既定工序、执行标准流程为目标，重在培养精准、高效的实践能力，并不深究技术背后的底层理论。理论形态与经验形态之分，可以解释应用型和技能型高校的技术活动差异。

以工程为例，两种导向的专业教育呈现出清晰的方向差异。科学导向的专业教育，以科学的方法解决工程问题，形成的知识形态被称为“工程科学”，“科学—工程（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构成其轴心。它是将基础科学研究的新成就转化为工程化的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新工程产品，相应的人才培养称之为 Advanced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Programs，目标为工程科学家与高级工程师。应用导向的专业教育，以运用成熟的共性技术，创造性地解决特定应用场景中的复杂工程问题，形成的知识形态被称为“工程技术”，“工程（技术）—产业”构成其轴心。它是面向 C 端、B 端与 G 端市场，从特定应用场景出发，将前沿性理论成果技术化、工程化，研发可推广的通用工程技术，创造新的工程产品。质言之，科学导向沿“科学—工程”的方向自理论知识源头推动知识创新，应用导向沿“工程/技术—产业”的方向自应用实践场

景牵引原创性知识落地。

总体而言，知识是大学组织的基本工作材料，主要包括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在现代社会，两者日益交融，知识的发现、提炼、保存、传播与应用构成相互衔接的完整活动过程。大学的分类主要体现在如何处理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的关系上及知识活动的功能重心不同，并由此形成不同的服务面向。

（二）服务面向：区域发展的价值论定位

知识性质决定服务面向。大学在不同层级的知识序列中，承担差异化的知识生产与知识转移职能，由此形成三类具有不同服务面向的大学。应用型高校的价值合法性由面向区域与服务产业所界定。

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学，核心关注世界发展底层原理、全人类共同福祉、个体生命价值等自然世界底层规律和人类世界宏大议题，聚焦全球性共性难题，以人文和基础学科研究为主，通过基础理论的突破和跨文化的理解，探索未知、构建人类知识体系，产出原创基础理论，输出具备全球视野的顶尖科研人才，参与全球治理、国际科技合作，提供解决人类共同挑战的底层理论支撑。

承担国家重大任务、服务国家战略的大学，核心关切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聚焦引领未来产业变革的关键核心技术迭代突破等国家发展根本性、战略性、紧迫性问题，深耕国家发展关键领域共性难题（如高端装备制造、核心芯片与基础软件、数字智能与工业底座等），以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并重，通过体系化工程解决方案与战略科技成果，靶向破解国家战略领域技术断点、产业堵点、创新痛点，全力支撑国家关键核心技术集中攻关与自主可控体系建设。

面向区域发展的大学，与所在区域发展深度绑定、高度共生，核心关切地方经济社会提质升级、民生改善与产业培育等区域性发展命题，聚焦区域产业发展、基层治理、乡村振兴、地方文化传承等本土实际问题，立足区域资源禀赋与发展需求布局学科专业。这类大学以应用学科、特色学科为主体，深耕区域发展一线，精准对接地方产业发展、社会需求，持续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输送高素质应用型人力资源、提供专业化智力支撑与技术服务，是赋能地方产业转型、夯实区域发展根基、推动属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力量。

应用型高校属于第三类，同时承接第二类的部分职能：既要回应国家战略

的整体部署，更要扎根区域发展的现实情境。综合知识性质与服务面向的双重界定，本文将应用型高校界定为：以实践导向的专业教育为载体，面向国家战略需求与区域发展需要，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核心使命，以共性技术研发、方案设计、工艺优化与成果转化为主要科研职能的高校类型。应用型高校在知识性质上，以实践导向的专业教育为知识生产的基本方式；在服务面向上，既回应国家战略的整体需求，又扎根区域发展的现实情境；在人才培养上，以造就具有工程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为核心任务；在科研职能上，聚焦共性技术研发、方案设计、工艺优化与成果转化，直接服务于产业技术的消化、改良与落地。不同类型高校的内涵比较如表 1 所示。

表 1　　不同类型高校内涵比较

大学类型	知识性质	服务面向	教育目标	知识活动
研究型高校	自由教育、理论导向的专业教育	人类共同议题、国家战略和重大任务	研究型人才	基础理论发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应用型高校	实践导向的专业教育	国家战略、区域发展	应用型人才	基于理论的技术活动：共性技术研发及属地转化、方案设计、工艺优化、基础性原创成果转化
技能型高校	基于实践的技能、经验形态的技能	区域发展	技能型人才	基于实践的技能活动：优化生产指令、编制规范操作、积累临场经验

事实上，自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社会对应用型高深知识与职业化专业人才的需求持续扩大，应用型高校建设已成为世界各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制度安排。纵观欧美高等教育演进，从英国新大学、德国应用技术大学到美国服务型大学，均呈现出聚焦应用、服务产业的共同趋向。它们通过扎根区域需求，履行社会服务职能，将自身打造为区域创新引擎，由此开辟出区别于传统研究型大学的办学新范式。

三、定位：打造区域发展的引擎

（一）区域发展：应用型高校知识活动的“机会空间”

区域是国家依据地理条件、资源禀赋及功能定位，为实现差异化治理而划定的特定空间单元，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单元”。区域发展统筹经济与社会两个维度：一方面，以产业转型升级和科技创新为动力，夯实区域竞

争力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以经济发展成果转化为普惠性的公共服务和民生改善为旨归，并在此过程中培育社会资本和区域认同。当前，各区域基于本地资源禀赋、地理条件、历史传统、技术积累，通过外引内培，构建了具有本土特点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产业集聚化、集群化、特色化发展。如重庆汽摩配产业、苏州电子信息产业集群、荆州水产养殖加工产业集群等，这些产业集群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处于压舱石和增长极地位。

创新理论认为，区域发展的本质是地方政府、产业、高校等区域多主体协同下知识持续生产、重组和再生的内生演化过程，技术创新已取代资源要素成为区域发展的核心要素。可见，区域发展是区域依托其独特的资源禀赋、地理条件、历史传统与技术积累，以产业为基础，以创新为先导，构建本土产业体系，实现经济社会目标的演变过程。

区域作为知识生产与应用的组织化空间，为应用型高校预留了开展特殊性知识活动的场域。区域产业的异质性决定了技术需求的本土化、情境化与多样化，导致技术知识的本土化、情景化和多样化。由此，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培育，在知识层面被还原为存量知识的激活转化与外部新知识的引入适配。因此，区域成为一个以资源和能力探索为中心的“机会空间”，制度环境、创新研发、知识流动、关系协作等多要素在这一空间中协同运行。这一空间中的知识活动不可能凭空进行，必须依赖本地组织化的知识机构持续生产、转化与传递。应用型高校由此获得其知识活动的专属场域与现实土壤。

应用型高校以“应用”为知识性质，以区域发展为服务面向，通过生产本土应用知识，为区域产业持续提供新工艺、新技术，培养应用型人才。

（二）区域发展的引擎：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现实要求

应用型大学在区域发展中承担五种职能（角色）：知识“工厂”型大学（Knowledge “factory”）、关系型大学（Relational university）、创业型大学（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系统型大学（Systemic university）和参与型大学（Engaged university），进而被视为区域创新系统的“系统构建者”。具体到中国情境，作为面向区域、提供应用性知识的大学类型，应用型高校根据其知识性质和服务职能，通过以下五种方式融入区域，成为区域发展的引擎。

其一，“生产”应用性知识，奠定融入的知识基础。区域产业大体分为传

统特色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两类，产业类型不同其面临的发展任务各异。应用型高校要立足知识活动谱系的“应用”环节，根据区域产业布局，以专业理论知识为载体，向区域产业持续供给应用性知识。例如，针对人工智能对传统特色产业的冲击，应用型高校要面向企业真实场景开展应用研究，将设备改造、流程再造中的技术难题转化为研究课题，以研究反哺改造，以改造验证研究。针对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应用型高校引入工程科学知识与外部先进技术，结合本地产业情境进行二次开发与适应性改造，将其转译为本地企业可用的技术方案、工艺标准与生产流程。

其二，与产业界建立双向互动的联系，“转化”应用性成果，跨越创新的“死亡之谷”。产业化创新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科研活动，应用型高校利用已有的技术成果进行产业化，能够帮助企业跨越创新的“死亡之谷”。一是联合区域企业牵头共建共性技术实验室、中试基地与工程化平台等跨界组织，实现高校理论知识与企业实践知识的双向流动，助力企业产线工程化开发与中试熟化；二是积极构建知识的“翻译”机制，主动嵌入区域产业体系的创新分工，将理论学术成果转译为可工程化、可操作的工艺方案；三是构建高校与产业的知识循环，将企业技术难题反向导入科研选题，让产业需求成为知识生产的出发点和检验标准，形成“应用开发—产业转化—需求反馈”的动态闭环，持续提升应用型高校的成果转化效率。

其三，超越单纯的技术知识的输出，承担孵化器角色，将技术产业化活动视为自身目标之一。在培养面向产业一线，兼具扎实工程实践能力、技术创新素养与创业精神的复合型人才的过程中，引入创业教育的元素，将创业活动中的需求识别、资源整合与价值验证机制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以产品或解决方案的形成过程贯通课程教学与实践训练，引导学生围绕现实需求开展技术应用、产品开发与成果转化。具体而言：在知识结构层面，以区域产业工程实践为参照重构课程体系，培养具备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适应行业技术迭代的高素质技术应用型和技术创新型工程技术人才；在能力结构层面，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让学生在真实工程情境和生产性项目中锤炼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实现从“知识接受者”向“产品创造者”的转变；在素养层面，将创新创业教育贯穿培养全过程，培育机会识别、风险承担与价值创造的意识。

其四，搭建跨界交流机制，优化区域创新的连接结构。区域内部创新不仅取决于各主体的创新能力，更取决于主体之间的连接密度与互动质量。应用型高校不能置身于所处环境之外，而要身处知识领域与产业领域、教育体系与经济体系的交界地带，占据跨界交流、知识交换的网络结构要点，为优化创新结构、聚合创新要素提供可能。为此，一是搭建组织化的协同机制，使应用型高校、企业、政府在同一制度空间内开展合作，降低知识流动的交易成本；二是建立人员双向流动机制，鼓励教师进入企业担任技术顾问，工程师进入课堂承担教学任务，形成跨越边界的“知识经纪人”群体，促进企业实践知识与学校理论知识的交互转化；三是建立非正式互动机制，通过技术论坛、行业培训、继续教育与社区服务，使高校成为区域社会网络的重要节点，在持续交往中增进创新主体间的信任积累与社会资本生成。

其五，参与区域公共治理，由要素供给向制度建构跃迁。应用型高校凭借专业能力与公共属性，嵌入区域发展生态，参与区域发展战略的形成与执行。一是提供决策咨询。依托长期服务积累的区域产业数据，主动承担产业规划编制、政策评估、标准制定等智库职能，为地方政府提供决策支持。二是制度创新探索。把产教融合实践中形成的产权安排、利益分配与协同治理规则，提炼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微观经验，当好区域制度演进的“试验田”。三是提供公共服务。开放科研设施，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服务终身学习体系，担当区域知识基础设施的公共责任，强化区域创新生态的普惠性与包容性。治理维度的功能实现，标志着应用型高校对区域发展的贡献由要素供给上升为制度建构，由创新过程的参与者上升为创新秩序的共同塑造者。

四、转型：内部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对应

应用型高校融入区域发展的程度取决于高校内部组织结构与区域产业结构之间的“对应特征组合”（corresponding profile）。这种“对应特征组合”不会自动产生，需要应用型高校从内部治理、产教融合、人才培养三个方面进行组织转型。

（一）内部治理转型：多元主体协同的能力建构

外部环境塑造高校组织。应用型高校要融入区域发展，实现产教深度融合，首先要完成领导与治理层面的转型，通过打造“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扩展的发

展外围、多元化的经费基础、激活学术心脏地带和一体化的创业文化”，增强“内外部组织协调能力”“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能力”和“博弈交易能力”。

其一，重塑领导核心与学术心脏地带，提升组织内外部协调能力。应用型高校嵌入动态开放的区域环境，其组织属性要求领导核心与学术心脏地带兼具跨边界协调能力，能够将外部需求转化为内部决策与组织行动。领导核心的重塑包括两个方面：对外，具备环境感知、机会识别与战略响应能力；对内，要具备弥合内部学术组织松散性和战略行动一致性的能力，使领导核心不仅成为学校事务的管理者，更要成为协调内外部事务的决策中心，让学校成为响应区域产业发展的敏捷组织。学术心脏地带即基层学术组织，是履行应用型高校组织使命、战略行动的中坚力量。重塑学术心脏地带的关键在于：一是重构以应用为导向的科研体系，针对区域内企业的具体应用场景，开展从文献导向到问题导向的科研转型，解决“产业急需且自身无法解决、研究型大学不愿做”的技术难题；二是重构以服务为导向的制度体系，在绩效分配、职称晋升、人才评价等方面建立以“服务效能、用户满意度、实际贡献”为指挥棒的激励机制，引导基层学术组织面向区域产业开展学术活动。

其二，拓展办学活动组织边界，增强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能力。制度层面，建立政校企行联动机制，建立由政府、行业、企业和学校四方代表组成的决策咨询机构，负责审议学校发展规划、专业布局、重大合作项目等事项；定期协商区域产业发展、人才需求与重大合作事项；及时发布技术动态、岗位需求与政策信息。组织层面，建立基层学术组织与区域产业的接口，以产业学院、联合研发平台、技术转移机构等边界组织为载体，将企业的生产场景、实践知识与技术需求直接导入基层学术组织的知识活动。

其三，鼓励产教合作的市场化行为，增强博弈交易能力。应用型高校市场化行为的核心在于塑造具有机会、风险偏好和跨组织协作的价值理念（即伯顿·克拉克的“一体化的创业文化”）。市场化行为是应用型高校以知识供给者的身份进入交易关系，将科技研发、成果转化、社会服务等办学活动转化为可计价的交易对象，经由博弈、谈判与契约从政府、企业和社会换取资源投入的组织行为。因此，一是培育创业文化。建立产业环境动态扫描机制，主动捕捉合作机会，健全容错纠错机制，推动市场化行为成为全校对外合作的自觉行

动。二是做强技术供给。面向产业真实需求开展联合攻关，加强中试熟化平台建设，提高成果工程化成熟度，增强技术交易议价能力。三是健全契约规则。完善产权界定、利益分配、成本分担、风险共担制度，实行合作事项清单化管理，做到义务可计量、权益可兑现、违约可追责。四是建强专业队伍。加强技术转移机构和技术经纪人队伍建设，将技术服务实效纳入考核评价与职称评聘，落实成果转化收益分配，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

（二）产教融合转型：知识双向流动的跨界创新

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是基于产教双方知识优势的互补结构，以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双向流动及相互作用为基本特征，以区域产业需求为导向，以培养学生创造性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和研发产业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为目的的教学科研活动，是应用型高校组织转型的核心。

应用型高校实现产教融合须具备四个基础要件：**一是依产定教**，区域产业的技术需求与应用型人才需求决定了应用型高校办学目标，既是应用型高校的办学出发点，也是产教融合的检验标准。**二是知识活动互补**，产教两个主体的知识活动处于同一知识创新链条的不同位置，即应用型高校的应用性知识生产转化要与区域产业的知识产业化应用形成互补关系，双方互为条件、相互检验。**三是知识双向流动**，即以产业学院等跨界组织架设迁移通道，使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对流互化、交互作用。**四是产教深度融合**，应用型高校与区域产业通过人员互聘、制度匹配、利益共享，实现一体化发展。这四个基础要件构成了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的基本特征，成为其与研究型大学、技能型大学产教融合根本区别所在。

因此，应用型高校在产教融合实践中，要遵循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以区域需求为导向，构建多元主体的产教协商机制。**牵头组建由政府、行业、企业与学校等多方参与的制度化组织，建立常态化协商与数据共享平台，动态绘制区域“产业人才需求地图”。在此基础上，将学科专业规划、招生规模调适及人才培养目标审定，全面纳入多方协商议程，以毕业生本地留用率、横向技术服务到款额等区域贡献度指标为刚性评价依据，实现专业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耦合。**其次，以知识双向流动为核心，重塑跨界知识生产与转化闭环。**制度化推动青年教师赴企业挂职攻关，将破解生产现场难题的实绩作为职称晋升的优先

条件；柔性吸纳企业技术骨干参与课程重构，将技改项目与故障案例转化为教学资源，最终形成“协同攻关—成果转化—迭代教学”的知识循环机制。**第三，以组织制度创新为保障，共建实体化运行平台。**面对动态产业环境，产教共建产业学院、共性技术中心等跨界组织，以企业真实需求为导向，共同开展应用型人才培养和技术攻关。

（三）人才培养转型：以产业实践胜任力为中心

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要立足高深知识的“应用”环节，以专业理论知识为载体，以服务区域产业为面向，以学科专业为中心转向以产业胜任力为中心，培养具备专业实践胜任力与创新能力的应用型人才。

其一，调整学科专业设置，适应区域产业快速迭代。一是面向产业技术交叉融合趋势，设置交叉复合型学科专业，如李泽湘倡导的“硬科技创业”，将机械、电子、计算机等知识要素整合于同一培养方案，回应智能制造对复合型人才的现实需求。二是以微专业作为敏捷化的补充形态，针对产业细分领域的特定能力需求实施短周期、模块化的精准培养。按照“近机类（近 X 类）”的思路组建专业群，以产业共性技术为纽带将相近专业集群化发展，增强对产业链的覆盖弹性。三是建立产业前沿技术信号常态化监测机制，使专业设置与调整由周期性行政决策转变为对产业变化的快速反应，实现专业边界与产业边界动态对齐。

其二，重构教学体系，突出岗位胜任力培养。以岗位胜任力为目标、以实践能力培养为牵引，重塑课程内容与教学过程。课程内容按照岗位胜任的能力单元重组，将知识传授嵌入能力生成的逻辑之中，扭转按学科演绎体系组织教学的传统做法；教学过程以项目制教学为主线，推行工程创业教育，让学生在真实或仿真的工程项目中经历“问题提出—方案设计—实施迭代—成果交付”的完整链条。实践知识与创新能力只能在“做中学”的过程中生成，项目制教学使知识传授与能力养成、工程训练与创业孵化在同一过程中统一起来。

其三，优化师资结构，建强三元协同的教学队伍。按照培养层级配置三类师资：一是学校理论课教师，承担基本理论、共性技能与方法论教学，筑牢学生知识根基；二是产业兼职教师，将生产一线的技术标准、工艺流程与工程经验带入课堂，打通实践知识进课堂的“最后一公里”；三是产业技术研发导师，

以真实产业研发项目为载体，指导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在技术攻关中完成学术训练。三类师资分别支撑基础知识传授、实践能力养成与创新能力淬炼，形成完整培养链条。

其四，转换科研范式，坚持从产业技术研发中定义问题。改变从文献中定义问题的学术逻辑，坚持科研问题源于生产实践的技术瓶颈，理论价值在实践中发现，研究成效在应用中检验。这一转换并非降低学术标准，而是知识生产方式的分化：科研活动由此嵌入产教融合的知识循环，为学生培养提供真实创新情境，为专业建设与教学更新提供持续知识来源。

五、结语

各国高等教育始终面临高深知识的普遍性、自主性与社会需求的具体性、情境性之间的结构性张力。这也是我国建设应用型高校的逻辑起点。中国语境下，应用型高校的知识性质和服务面向，决定了其是以实践导向的专业教育为载体，以培养应用型人才和应用技术研发为核心使命，以区域发展为服务职能的高校类型。应用型高校要成为区域发展的引擎，需要从内部治理、产教融合和人才培养三个方面转型。

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背景下，高校分类改革并不意味着应用型高校与研究型高校、技能型高校之间是刚性独立、彼此割裂的关系，而是在承认其知识基础、活动重心与服务面向差异的基础上，形成相对独立、相互联系、功能互补的类型结构。事实上，三类高校的知识本体既相对自主、相互联系，又相互校正与塑造，存在着明显的协作效应，为统筹推进高校分类改革与协同发展提供了理论空间。

（信息来源：余东升、朱俊、汤瑞丽《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6 年第 6 期）